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学探析与设计转化研究

韩璐

(中央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目的** 基于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 分析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特征, 旨在探索少数民族刺绣图案在现代文创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与转化路径, 从符号学视域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阐释和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借鉴。**方法** 通过在黔东南苗族地区使用田野调研、文献资料收集、设计实践等方法, 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工艺、纹饰、色彩等方面的代表性符号特征进行探讨分析, 运用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从语构学、语用学、语义学等层面解读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之间的符号关系, 以现代设计实践为方法, 从代表性符号元素中提取设计因子, 并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进行设计转化。**结论**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艺术特征鲜明, 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审美风尚, 从语构、语用与语义等维度对其工艺、纹饰和色彩的符号学要素进行提取衍生, 探求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元素设计转化与创新应用的多种可能性, 不仅能够使现代设计产品蕴含民族文化特色, 而且有助于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自身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黔东南苗族; 苗族辫绣; 符号学; 设计转化; 文创产品设计

中图分类号: TB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3)22-0309-13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22.035

Semiotic Analysis and Design Transformation of Miao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HAN Lu

(Academy of Fine Ar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symbolic feature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based on the Morris semiotic triplicate metho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ethnic embroidery patterns in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provide mor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literature collection, design practice and other methods in Miao's residential area in southeast Guizhou, the representative symbol features of the process, decoration, color and other aspect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we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and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was interpre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uring, pragmatically and semiotically with the Morris semiotic trism. With modern design practice as the method, desig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from representative symbolic elemen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used as the carrier for design transformation. Miao braid embroidery in southeast Guizhou has distinct artistic features and certai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trends. The semiotic elements of process, ornamentation and color are extracted and deriv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structure,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so as to explor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in southeast Guizhou, which can not only make modern design products contain ethn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KEY WORDS: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 Miao braid embroidery; semiotics; design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在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民俗、信仰、审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苗族刺绣图案逐渐成为典型的图形符号^[1]。辫绣作为黔东南苗族刺绣的代表性苗绣绣法之一,主要流传于巴拉河流域的凯里、台江和雷山等地,是将丝线编织为辫带以代替传统绣线的刺绣方式。黔东南苗族辫绣流程繁复、构图严谨、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鲜明的文化特色。目前在学术界,针对苗族辫绣的工艺流程、纹饰图案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赵红艳等^[2]从主题、造型、设色等几方面对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纹饰特征进行了解读和探讨。黄玉冰^[3]阐述了西江苗族辫绣的技艺特征与制作过程。卢靖^[4]将黔东南苗族辫绣的工艺技法、美学价值与现代网络载体相结合,旨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黔东南苗族刺绣的保护与传承。但多数学者仅是在其著作或文章的章节段落中涉及到黔东南苗族辫绣的工艺特色,而在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视觉符号进行解构与重组,并借用现代设计思维与方法将其视觉符号进行设计转化的研究方面尚有待加深。鉴于此,本文以博物馆馆藏、苗绣传承人的私人藏件,以及民间调研收集来的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为研究对象,以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为理论指导,在充分解读辫绣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来探讨黔东南辫绣图案的符号特征。通过辫绣图案艺术与符号特征之间的关系转换及辫绣图案元素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融入,寻求承载黔东南苗族辫绣艺术现代价值的物质载体,以促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辫绣的艺术面貌,让辫绣焕发新的生命,为其传承和发展提供动力。

1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特征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以工艺、纹饰、色彩等要素来书写该族群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些符号语言的构建与使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来源和文化因子。透过这些文化要素,人们也可以从中感悟到黔东南苗家人的思想观念、情感体系、审美特色,也因此成为黔东南苗族辫绣的代表符号之一。

1.1 “以线编辫”的工艺符号

黔东南苗族辫绣在织造时,首先需要根据辫带的宽窄、粗细和色相等因素将同一色调的彩色丝线或棉线按照四根到十几根不等为一组,用一种形似板凳的木制辫带机将丝线编结成一种宽度约为3 mm的扁平辫带,见图1。其次要剪制绣花底样,勾勒出刺绣图案的蓝本。苗绣花样在刻制时会根据绣面装饰部位的大小位置进行调整,将古法制作的白皮纸或红纸裁好叠齐,并以纸钉加固,然后上面用铅笔或指甲画出图案轮廓,再放到蜡盘上用斜刀刃(也有刀剪并用或只用剪刀的情况)进行刻制。图案多是以暗刀或刺孔组成的结构线,整个花样的造型朴拙洗练、浑厚

粗犷、装饰味浓。再次,将剪好的图案稿样粘贴裱到绣布上,再罩上一层薄皮纸。最后,将编好的辫线起始端固定后平置于绣布上,按图案轮廓以一定的纹理由内至外依次循环填绕平整后,另取同色丝线将它固定成图即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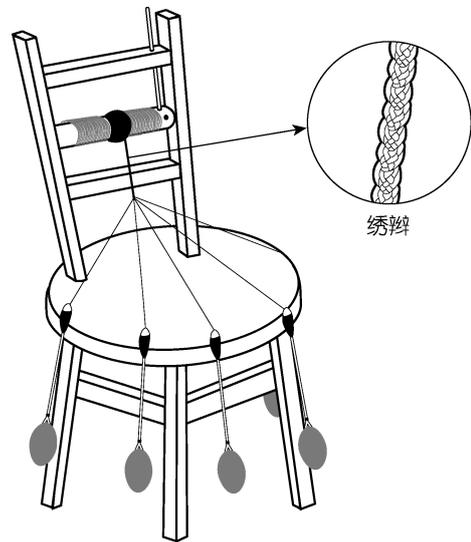


图1 辫带机
Fig.1 Braiding machine



图2 辫绣编织过程
Fig.2 Preparation process of braid embroidery

由这种特殊的制作工艺可知,相较于在针线的交织中展现细腻平整的平绣、破线绣等苗绣绣法,辫绣图案最终形成了表面针向规则、层次丰富、丝辫交错、线眼清晰的纹饰形态,在方寸之间尽显朴拙洗练、粗犷厚重之感,渲染出形与色之间的艺术表现力和装饰意味。这种工艺方式也决定了黔东南苗族辫绣与其他绣种的与众不同之处,成为辫绣最具代表性的符号。黔东南苗家人生活环境相对封闭,长期自给自足的生活,也使得传统民族文化、手工技艺得以保存完好。“以线编辫”的工艺方式不仅成为了辫绣图案的一种代表性符号特征,也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表现形式和结构规律的最终呈现提供了客观的技术加持,是黔东南苗家人物尽其用朴素造物观的直接表达。

1.2 “崇尚自然”的纹饰符号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饰符号十分丰富，纹饰特征明显，主题明确，多数绣片都能直观地判断其纹饰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动物纹饰、植物纹饰和人物纹饰这几类。

本文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纹饰题材组合形式分为三类，分别是动植物图组、动物图组、混合图组（人物和动植物图组），其中动物纹和植物纹出现的频率较高，见表 1。动物图案主要有龙纹、蝴蝶纹、鸟纹等。植物图案包括花卉纹、桃纹等，虽然有些植物纹饰造型表现出明显的程序化特征，但依然可从其局部看到对自然对象的模糊视觉表象特征。这些图案题材均出自《苗族古歌》所记载的苗族创世神话，苗族人民将蝴蝶视为万物始祖，蝴蝶妈妈生出十二个蛋，吉宇鸟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后诞生了生灵万物和人祖姜央，蝴蝶纹也因此成为后人崇拜祖先的精神寄托与情感转化的图腾。在苗族人眼中，把鸟比作男阳是不分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鸟纹与祈育崇祖的潜意识

有很大关系^[5]。龙纹是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中出现十分频繁的刺绣图案之一，它源于蝴蝶妈妈所诞下的十二个蛋之一，本在苗族社会中无特殊的地位，但随着与外界文化的交融与演变，龙纹逐渐呈现出多种形象，如蛇龙、鱼龙、双头龙、飞龙、蜈蚣龙等。黔东南苗族的龙纹不像汉族龙纹被封建社会皇家视为最高权力的象征，其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张牙舞爪给人以敬畏恐惧之感^[6]。他们创造的龙纹形象总体风格憨态可掬而又充满亲和力，这也诠释了黔东南苗族与生俱来的生命平等的共生意识与天地寻常的等级观念。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饰讲究构图上的形式美感，其图案元素的构成规律主要有两种。

1) 异形同构是将本无关联性的物体通过形态的相近性联系成一个整体，传达出某种特定的信息，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和价值^[7]。如表 1 中编号 4 所示的纹饰，花朵与蝴蝶交融叠加，互为变化，产生亦花亦蝶的装饰美感。

表 1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纹饰组合形式
Tab.1 Pattern combination form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题材组合形式	编号	实物原图	构成要素	图案语义	构图形式
动植物图组	1		飞龙、猫、花卉等	祖先崇拜、天地寻常	满铺式
	2		蝴蝶、花卉	对生命的尊崇与敬畏	对称式
	3		鸟、花卉	崇尚自然，寓意后代兴盛、人丁兴旺	自由式
	4		蝴蝶、花卉	祈求祖先庇佑，寓意吉祥幸福	对称式
	5		石榴花、蝴蝶	对生命的礼赞与感恩	对称式
	6		花卉、蝴蝶	自然崇拜，祈求富贵安康	对称式
动物图组	7		鸟、鱼等	祈求种族繁衍、平安兴盛	满铺式
	8		龙、蝴蝶	祈育崇祖、子孙繁盛	满铺式

续表

题材组合形式	编号	实物原图	构成要素	图案语义	构图形式
动物图组	9		猫	保佑子孙健康长寿, 驱邪避难	满铺式
	10		双头蜈蚣龙	祖先崇拜、生命平等	对称式
混合图组	11		人物、龙、牛、蝴蝶等	祈福丰收、降福消灾、风调雨顺	满铺式
	12		人物、鸟、龙、蝴蝶、鱼等	自然崇拜、万物有灵	对称式

2) 同形异构是将外形相似或相同的两种生物进行组合, 如表 1 中编号 10 所示的双首共身龙纹, 其浓缩凝练了自然界中诸多的元素, 介于真实形体与几何形体之间, 借用“双首”的形式来重点强调龙的头部。这些纹饰或是为了加强视觉效果, 或是为了均衡与对称的讲究, 鲜明地体现了“形中之形、象中之象”的表现手法, 体现了苗族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既折射出黔东南苗族万物有灵、生命同源的朴素世界观, 亦表明其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崇尚之心。

1.3 “五彩共施”的色彩符号

色彩作为一种通过视觉获取感知的符号, 亦能够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标志特征, 相对于理性的造型艺术, 它能够直观地传达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特质^[8]。在对万物类象的认知过程中, 人们通过对颜色进行分类

编码、赋予意义等方式, 使色彩成为表达某种特定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9]。在色彩的搭配与使用上, 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色彩体现了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普遍的用色规律, 擅长将多种颜色和谐地布置在同一画面中, 以高纯度、对比鲜明的装饰色彩为美。为了对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的色彩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 本文借用 NCS (Nature Colour System) 自然色彩体系来有效地获取其色彩特征。首先, 将所收集到的刺绣片导入到专业图形软件 Illustration 中提取色彩, 并让这些颜色在装有 NCS 色彩系统插件的调色板中读出色彩的相应色值。其次, 根据色彩编号将其定位到 NCS 自然色彩系统的色相环中。最后, 在此基础上对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色彩的色相进行分析。

黔东南苗族刺绣的色彩分布范围很广, 在色相环的各个色域中都有所涉及 (如图 3a 所示), 这展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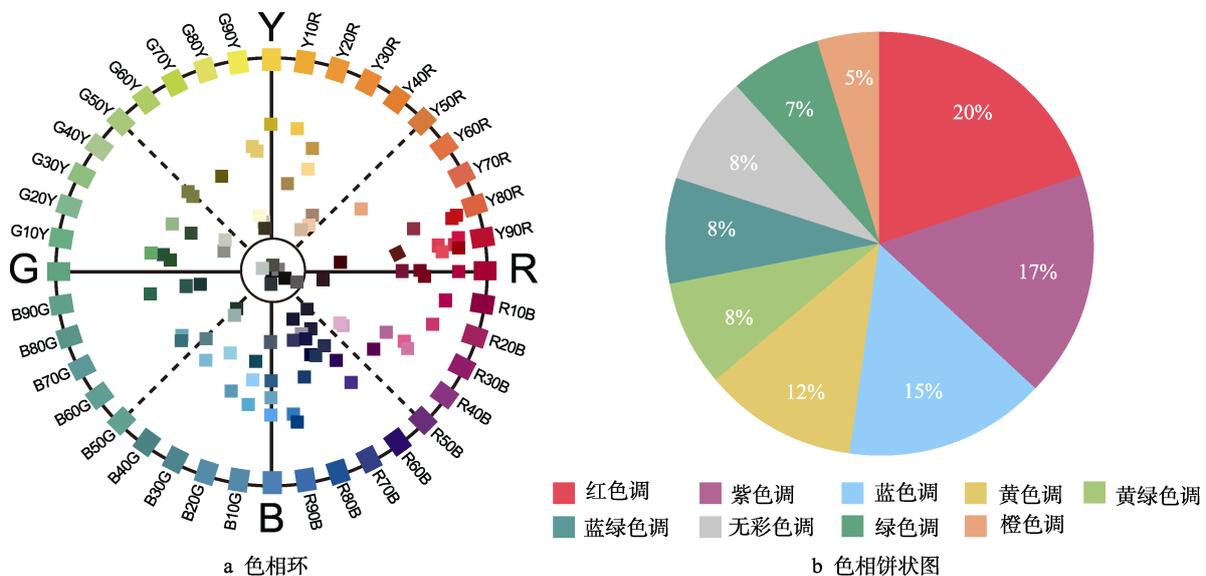


图 3 黔东南苗族刺绣绣片色彩提取
Fig.3 Color extraction of braid embroidery pieces of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

黔东南苗族辫绣“五色共施”的色彩特征。色彩运用频率依次为红色调色彩、紫色调色彩、蓝色调色彩、黄色调色彩、黄绿色调色彩、蓝色调色彩、无彩色调色彩、绿色调色彩、橙色调色彩，见图3b。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绣布常以红色、黑色或深蓝色为底色，图案外型以高明度、强对比线条勾勒，在此基调上配以中度对比色彩进行点缀调和。以深蓝色为底的辫绣绣片，纹饰结构多采用高明度、中纯度色彩，如紫色、蓝色等，内部细节则以红色、绿色、黄色等高明度、高纯度的色彩进行装饰，形成视觉上的强烈碰撞，见图4a。以红色为底色的绣片，丝线多采用中纯度邻近色或低纯度对比色，注重色彩的分布位置和

整体色彩的协调性，如运用蓝色、紫色为纹饰主体颜色，黄色和淡绿色为纹饰结构色，在这些色彩之间寻求平衡点，形成丰富而不杂乱、靓丽而不艳俗的色彩关系，见图4b。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五彩共施”色彩符号的形成是因为苗族人善于利用自然环境优势，依然保留着从植物中提取染料染制布料或是绣线的传统染色方式，如红色是从椿树皮、茜草等材料提取而来，靛蓝染料是从植物蓼蓝中提炼而出等。这种古老的染色方式赋予了精美的黔东南苗族辫绣自然的气息，是少数民族女性勤劳与智慧的象征，亦表明了黔东南苗族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美学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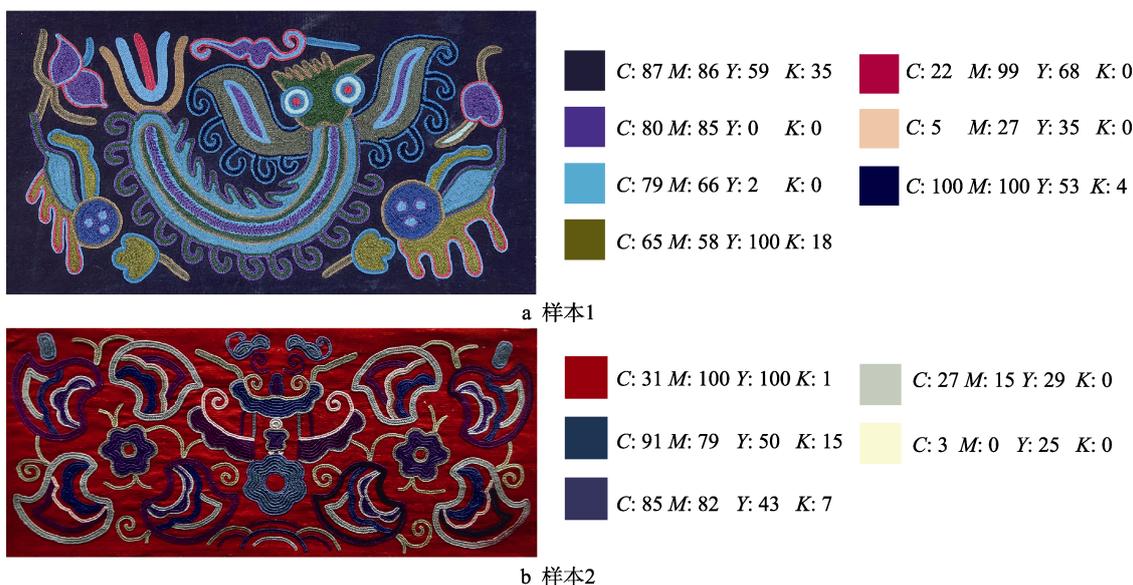


图4 黔东南苗族辫绣绣片色彩提取

Fig.4 Color extraction of braid embroidery pieces of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

2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学要素分析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将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对符号理论进行更加系统化的归类，提出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种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学科划分，并且沿用至今，成为了人们广泛采用的符号学学科分类法。莫里斯在《指号、语言与行为》中提到“莫里斯的符号学划分改变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语构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则研究‘符号与其所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10] 依循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本文从语构学、语义学及语用学三个学科的视角及理论维度予以切入、分析。

2.1 语构学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关系

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中，语构学侧重于解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构成关系。研究涉及到黔东南苗族辫绣的三个代表符号之间的相互组合关系，就辫绣图案“以线编辫”的工艺符号而言，其独特的工艺手

法使得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纹饰图案独具粗犷、朴素之感，通过丝辫盘缠的方式造就了凹凸有致、造型圆润的图案艺术。同样，辫绣图案形态作为黔东南苗族文化内涵的物态承载，其纹饰形态虽然来源于自然与生活，但并非仅是对自然事物的客观摹写，而是在各种形象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对具象事物进行抽象化、夸张化的处理后形成的。通过动物纹饰和植物纹饰等不同符号要素的组合方式，来强调“崇尚自然”的朴素世界观。“五彩共施”的色彩符号也是展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艺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黔东南苗家人从当地特有的植物中提取染料，结合实际生产技术，染制出多种颜色，并将其映射在布料之上，呈现出“五彩共施”的视觉效果，是黔东南苗家人色彩观的真实写照。这三个符号之间既独立存在又相互统一，工艺符号为纹饰符号的呈现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方式；色彩符号以视觉感知与视觉交流的形式，为纹饰符号的呈现赋予了寓意性与色彩风格；纹饰符号在这两者的加持下引导人们关注视觉物象的本体和创

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实现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融合。

2.2 语义学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解读

索绪尔(Saussure)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语义学研究的也就是符号的所指、能指与两者间意象作用之间的关系^[11]。对于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视觉符号的语义学,主要从符号的外延语义(能指)和内涵语义(所指)两方面进行分析。能指主要是指黔东南苗族辫绣的规律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物质要素,涉及到工艺、纹饰和色彩符号。所指主要研究黔东南苗族辫绣隐藏在符号背后的内涵语义,即非物质要素,涉及各符号之间的文化信仰、思想观念、审美特征、象征意义等(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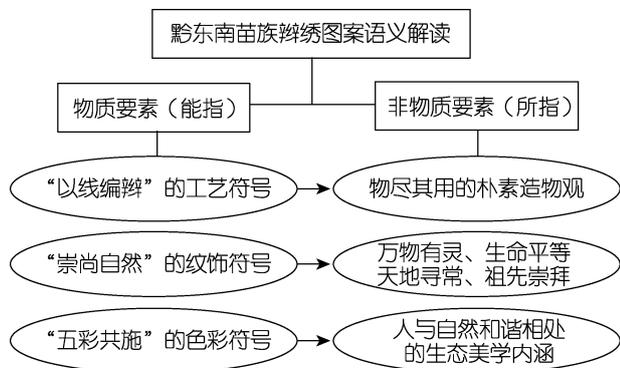


图5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语义解读框架

Fig.5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在传统审美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工艺、纹饰与色彩等元素,运用“以物达意、物意一体”的造物逻辑与感知方式,创造出本民族独特的视觉形态体系,这些元素或形态便蕴含了文化或精神层面的意涵,具备了符号的作用,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符号语言至此形成完整齐备的语义。对应于苗族,这些符号是外在形式和内在意义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肯定,每一种符号都和一种恒定的意义相结合。只有当符号通过内在意义的浸润获得了灵性与活力,其外在形式才会被作为审美对象^[12]。

2.3 语用学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关系

语用学旨在以使用者为视角,解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13]。分析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在现实语境中的应用与社会性意义,有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黔东南苗族辫绣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应用载体主要为苗族传统服饰、配饰、背面等,被广泛运用在上衣的领、襟、袖,以及背儿带处。辫绣图案在服饰载体上的应用主要突出装饰性、寓意性和实用性,使用者主要是黔东南苗家人,

在日常生活或节日盛典中穿着。随着文化旅游市场的发展,其应用载体也在使用者的演变中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如耳环、T恤、背包等文创旅游产品。一方面,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常以物质载体记录文化事件与民族信仰,黔东南苗族辫绣的传统工艺和图案符号成为承载民族文化的最佳载体,并依附于多种工艺品种和图样样式作为视觉符号的语用载体,成为民族文化向外展示与传播的媒介;另一方面,饰有精美图案的黔东南苗族辫绣织绣品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部分购买者已经将其视为当地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用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和购买欲,而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传承性和社交性也被进一步加强。

3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转化

符号学对现代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门研究符号和意义的学科,为现代美学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符号学视域下通过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视觉符号元素的解构与分析可知,辫绣图案具有工艺独树一帜、纹饰造型多样、色彩绚丽多样等美学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优势,并具备丰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积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文化语境的冲击下,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层面逐渐过渡到精神层面,用户在消费“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产品的外在信息,也更加注重文化产品自身传递的某种特殊意义及其背后蕴藏的内在因素^[14]。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通过将现代设计方法介入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中,不仅拓展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传承路径与传播载体,也有助于寻求辫绣图案符号与现代化市场需求的匹配路径,从而使其在时代的嬗变中继续发展下去。

3.1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文创产品设计流程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转化,以莫里斯的符号学视角对符号元素的分析为前提,从语义、语构和语用等维度构建符号学的解读与转化体系,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进行创新设计,与“意”“形”“用”等层面对应,使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元素最终转化为可以被感知、理解的文创产品体系,设计流程见图6。

1) 在语义维度层面,在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工艺、纹饰和色彩符号特征深层内涵的基础上,建立图案图谱,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形态显性文化与隐性内涵因子进行整体解析,深入分析黔东南苗族辫绣纹样的符号特征,概括、提炼并简化代表性符号对象。

2) 在语构维度层面,利用平面构成的设计方法对其符号元素进行重组与再设计,采用均衡对称的构图方式对图案进行创新演变,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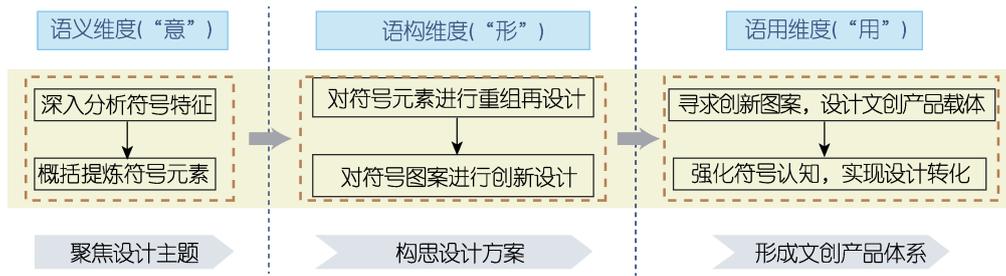


图 6 符号学视域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流程

Fig.6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 design process in southeast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进行创新设计转化, 探索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创新拓展的可能性, 赋予其时代性和现代性。

3) 在语用维度层面, 以现代生活美学价值为切入点, 寻求图案形式、内涵与现代文创产品载体的关联性, 探析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融入现代生活的新载体与新形象, 强化符号认知与符号价值, 实现设计转化。

3.2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的提取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的提取是其设计转化的基础, 能够多维度拓展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生存与运营空间, 不仅能够丰富文创产品的设计语义与文化内涵, 而且能让具有民族认同感的图案与色彩获得现代意义, 从而促进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现代化活态传承。

3.2.1 图案元素的提取与简化

本文在提取图案元素时采用元素提炼法和抽象简化法。元素提炼法是指从数据分析后的原有经典图案中提取重要的设计元素或设计因子^[15]。抽象简化法中的“抽象”是指将事物中共同的、本质的、具有代表性的属性进行抽离, 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 “简化”则指通过提炼、概括等方式使复杂的事物变得简约, 目的是突出事物的本质或典型特征^[16]。本文从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崇尚自然”的纹饰符号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龙纹、蝴蝶纹、花卉纹、鱼纹、鸟纹作为初始元素。首先, 运用元素提炼法从这些初始元素中提取出所需的设计因子, 由于辫绣图案是以弯曲辫带层层盘绕的特殊工艺方式汇聚而成, 因此这些纹样元素均呈现出多重层次的视觉效果。其次, 运用抽象简化法对这些设计因子进行形态上的简化。在保留辫绣工艺多重层次效果的前提下, 规范纹饰的结构走向, 去掉多余线条, 最后将其改良为造型流畅、形象清晰的纹饰表现, 以此带来新的视觉美感, 为黔东南苗族辫绣纹样的设计转化提供详实的造型符号元素。此次提取的纹饰设计因子在表达形式上灵活多变, 主要由曲线、弧线和圆形构成。从美学视角分析, 具有圆润饱满、朴实和谐的艺术美感, 见表 2。表 2 中编号 1 绣片提取的是龙纹和花卉纹。龙纹元素为自由组合的不对称纹样, 分为龙头、翅膀、龙身与龙尾几部分, 在翅膀和身体的下方均有“L”型装饰。花卉纹

在对称的美感中又追求差异化, 花朵部分由两个卵形组成, 枝干由曲线构成。表 2 中编号 2 绣片提取的是鱼纹、鸟纹和蝴蝶纹, 这一组设计因子在外形上兼具抽象性和具象性, 特征明确且易于识别。鱼纹在结构上呈团状, 充满动感。鸟纹在造型上强调翅膀和尾巴的动势走向和比例关系。蝴蝶纹则采用俯视视角来表现两只翅膀的外部特征与灵动之美。表 2 中编号 3 绣片提取的是石榴花纹和蝴蝶纹。这两者在外形上均为左右边线的对称形状, 仅用几根弯曲多变的线条就生动地呈现出石榴花与蝴蝶之间的动静状态。

表 2 纹饰元素提取

Tab.2 Extraction of decorative elements

编号	实物图案	图案元素提取
1		
2		
3		

3.2.2 色彩元素的提取与凝练

色彩作为现代设计中的视觉表征元素, 对设计风格的决定和设计氛围的烘托有着直接作用。色彩的变化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波动, 各类不同消费人群对色彩的感知与喜爱会有所区别, 因而丰富的、多样化的配色方案对文创产品设计来说尤为重要^[17]。因此, 本文在“五彩共施”色彩符号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色系绣片, 使用 Photoshop 软件, 对图片的主要颜色进行提取, 见表 3。表 3 中编号 1 辫绣绣片现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从台江县征集而来, 它是在黑色的底色上以不同深浅的黄色、黄绿色等同类色为主, 局部点缀紫色进行冷暖对比与调和, 整体色调统一和谐, 内敛而又含蓄。表 3 中编号 2 为台江县苗绣非遗传承人石传英所创的浩邓苗族民间博物馆收藏的辫绣绣片, 在红色的底色上, 采用低饱和度

的绿色、蓝色进行纹饰刺绣,各个色块所占面积不等,使色彩关系出现强弱对比,以此达到整体的视觉均衡。表3中编号3绣片为笔者在雷山县郎德苗寨调研

中所收集到的辫绣绣片,其色彩运用广泛,整体色调明亮而又充满现代韵味,局部的玫红与绿色、黄色、蓝色等冷暖色调的对比形成了丰富的视觉层次感。

表3 色彩元素提取
Tab.3 Extraction of color elements

编号	实物图案	色彩元素提取
1		■ C: 87 M: 83 Y: 91 K: 75 ■ C: 61 M: 47 Y: 85 K: 3 ■ C: 39 M: 51 Y: 80 K: 0 ■ C: 8 M: 16 Y: 49 K: 0 ■ C: 49 M: 42 Y: 24 K: 0
2		■ C: 1 M: 96 Y: 66 K: 0 ■ C: 88 M: 55 Y: 81 K: 20 ■ C: 94 M: 39 Y: 74 K: 1 ■ C: 72 M: 12 Y: 36 K: 0 ■ C: 77 M: 15 Y: 0 K: 0 ■ C: 87 M: 36 Y: 11 K: 0
3		■ C: 86 M: 83 Y: 79 K: 68 ■ C: 26 M: 16 Y: 41 K: 0 ■ C: 40 M: 53 Y: 60 K: 0 ■ C: 19 M: 40 Y: 4 K: 0 ■ C: 10 M: 89 Y: 69 K: 0 ■ C: 50 M: 15 Y: 61 K: 0 ■ C: 6 M: 45 Y: 53 K: 0 ■ C: 64 M: 7 Y: 19 K: 0 ■ C: 31 M: 75 Y: 9 K: 0 ■ C: 52 M: 90 Y: 91 K: 3 ■ C: 11 M: 87 Y: 26 K: 0 ■ C: 26 M: 45 Y: 85 K: 0

3.3 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与应用

3.3.1 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具有质朴和色彩绚丽的特征。但笔者发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多为平铺式构图或中心对称式构图,绣片中心位置多为单独动物纹或植物纹,四周填充以其他动植物图案,如花草、蝴蝶等。这些图案通过构图、色彩与线条之间的夸张、变形,以及自由组合等艺术手法被组织在同一画面中。这样的构成方式虽然能够给人以直观的视觉体验,使观者清晰明了地获悉其内容,但仅是将提炼出来的原有图案以这种平铺直叙的设计手法套用到文创产品设计中是不能与现代设计审美需要相契合的。因此,本文采用形状文法和符号的重组重构法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进行设计转化。

形状文法是图案纹样设计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18],其常通过移动、缩放、旋转、镜像、置换、增删等演变规则,在保证核心元素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纹样创新设计演变。本文将独具特色的龙纹、花卉纹、蝴蝶纹等纹样通过多次形状文法的变化规则(如图7所示),派生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样。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方或四方连续的构图规律对这些图案纹样进行重新构造组合(如图8所示),并根据所提炼出的色彩元素进行着色,使其成为具有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创新纹样形式。根据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族传统,创新演变后的龙纹,是取其“风调雨顺、驱邪避灾”的文化语义,花卉纹强调“热爱自然、平安健康”的文化意涵,蝴蝶纹则是“祈求生活美满、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景。使用形状文法和二方或四方连续演化生成的具有规律性、创新性的黔东南苗族辫绣纹样,既保留了传统纹样的典型特征,又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

案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奠定基础。

符号的重组与重构是现代设计中视觉元素表现的重要方法^[19],以此方法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所提取的设计元素进行抽象变形或解构重组,在保留中心对称式构图的基础上,运用平面设计的构成原理,尝试打破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平铺式构图方式,通过增加图案中的圆形和方形元素,以轴心对称的方式将所提取的符号元素以相互叠置的表现形式来体现各符号元素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韵律感与节奏感,增加其符号元素的神秘感,从而激起观者的视觉感知和关注度。方案一(如图9a所示)以花卉纹为中心图案,周边辅以龙纹、鸟纹、蝴蝶纹等元素,打破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元素的常规排列规律,结合现代设计均衡与对称、节奏与韵律兼顾的形式法则,将纹饰元素进行排列组合,且图形符号之间以低饱和度的色彩关系来淡化图案间的色彩冲突。方案二(如图9b所示)以对称龙纹为主视觉的中心元素,采用玫红和绿色这组对比鲜明且颜色丰富的色彩搭配,基于整体与局部之间大调和、小对比的配色思路,以邻近色和对比色的点缀,调和丰富图案的层次关系,使图案设计符合对比适度、艳而不俗的现代美学原则,明快色调的图案整体和谐呼应,给人以温暖祥和之感。方案三(如图9c所示)是以单个龙纹作为构图的主视觉中心点,将蝴蝶纹、鸟纹和花卉纹围绕中心图案进行重复而有规律的排列,采用方圆结合式构图,以便形成视觉流动,采用蓝色、绿色、红色等高饱和的色彩来概括丰富的纹饰物象,在色彩的秩序与和谐上尝试寻求突破,追求多层次的对比变化效果。

3.3.2 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应用展示

为了迎合当下的审美理念,文创产品的主视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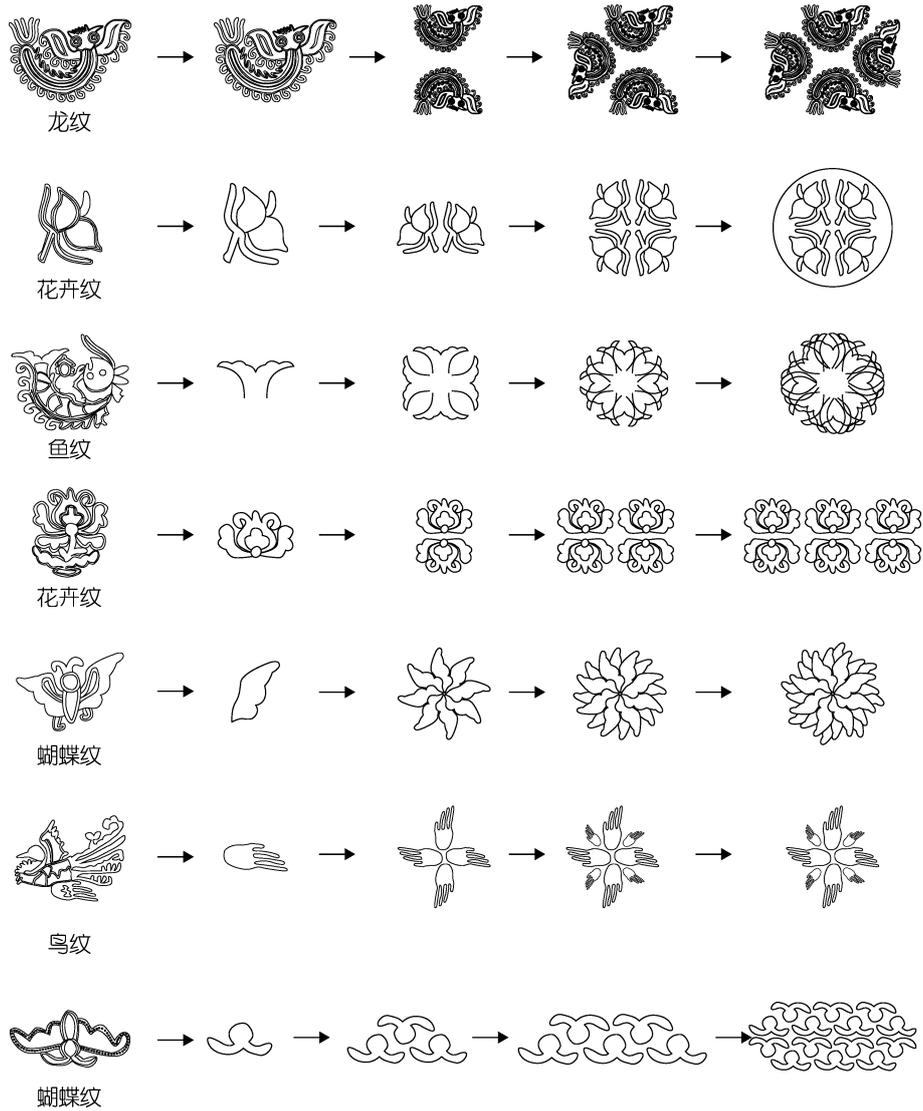


图 7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形状文法演变

Fig.7 Evolution of Shape Grammar for the Design Factor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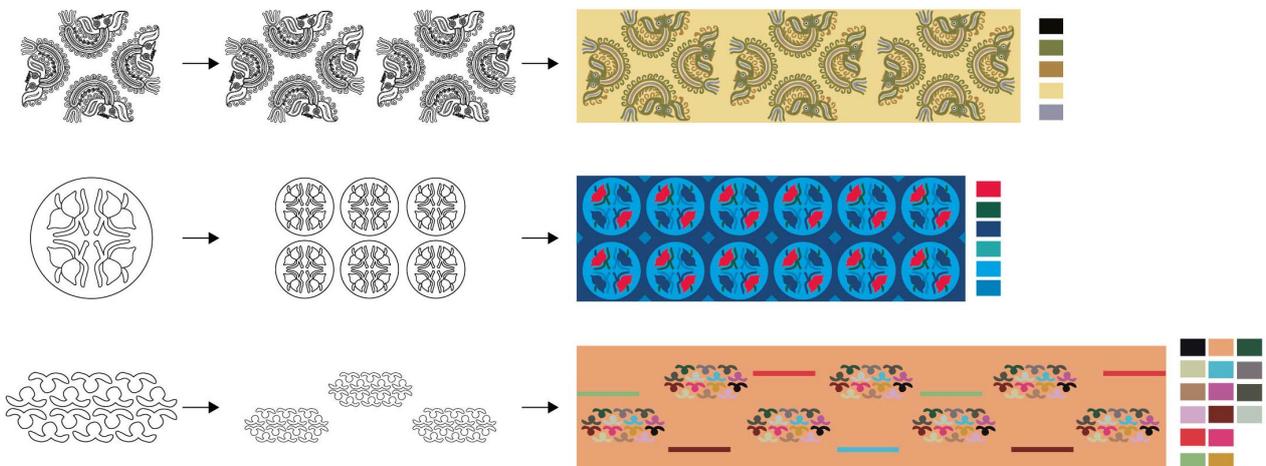


图 8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二方/四方连续构图演变

Fig.8 Evolution of two/four square continuous composition in design factor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案设计在遵循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特点的基础上,以多样化的配色和图案组合方式呈现,以现代产品设计的实用性、文化性、审美性为指导原则,将带有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特征的文化元素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进行语义和文化内涵的关联。考虑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承载形态与实用功能,对其功能和形态进行创新转化来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求,是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创新发展的新途径。因此,此次主题文创产品设计最终以文创礼盒的形式呈现,分别为“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与“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见图10。以系列化文创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体验,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引起观者进一步挖掘和探讨该文创产品视觉表征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的兴趣,打造出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的黔东南苗族辫绣文创产品。

黔东南地区夏季风景优美,但温度较高、紫外线较强,“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从降温防晒这一视角出发,在满足功能需求、审美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基

础上,结合当下流行的设计风格,设计出防晒帽、晴雨两用伞、便携水杯、折扇、防晒冰袖,以及口罩等产品,将经过创新演变的图案设计运用到这些载体中,使这些创新设计后的纹样形式整体和谐而又有呼应,繁复而不失美感,提升了产品的精致感与时尚度,见图11。以冰袖设计为例,其灵感来源于花卉纹常用于袖口的使用传统,同时根据花卉纹中的花瓣具有循环共生、周而复始的特点,以冰袖这一产品载体将寓意着幸福美好的花卉纹代入到现代生活中,不但能够让受众感知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还可以使受众在符号消费的过程中增强符号认同感。同时,“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还能够完美契合用户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多种使用场景。无论是来黔的外来游客还是在黔的本地居民,在户外活动中使用这一组防晒产品都可以有效地防止紫外线伤害,遮挡阳光直射,降低身体温度,消费者也可以在流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向周边人群宣传黔东南苗族辫绣文化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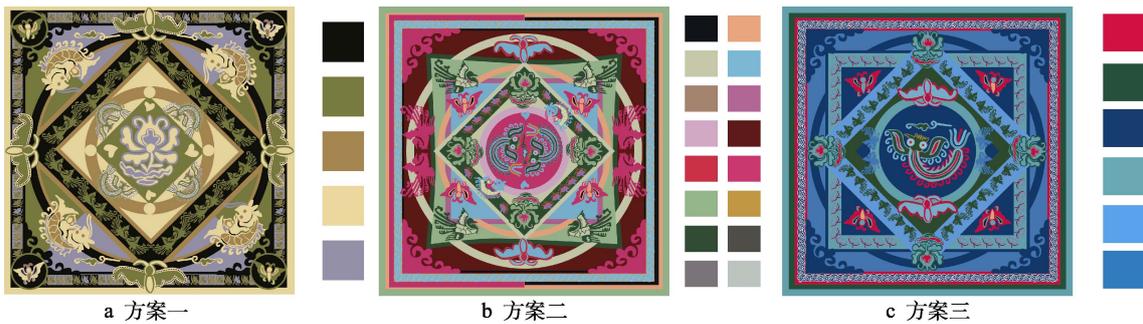


图9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方案

Fig.9 Design scheme for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 in southeast Gui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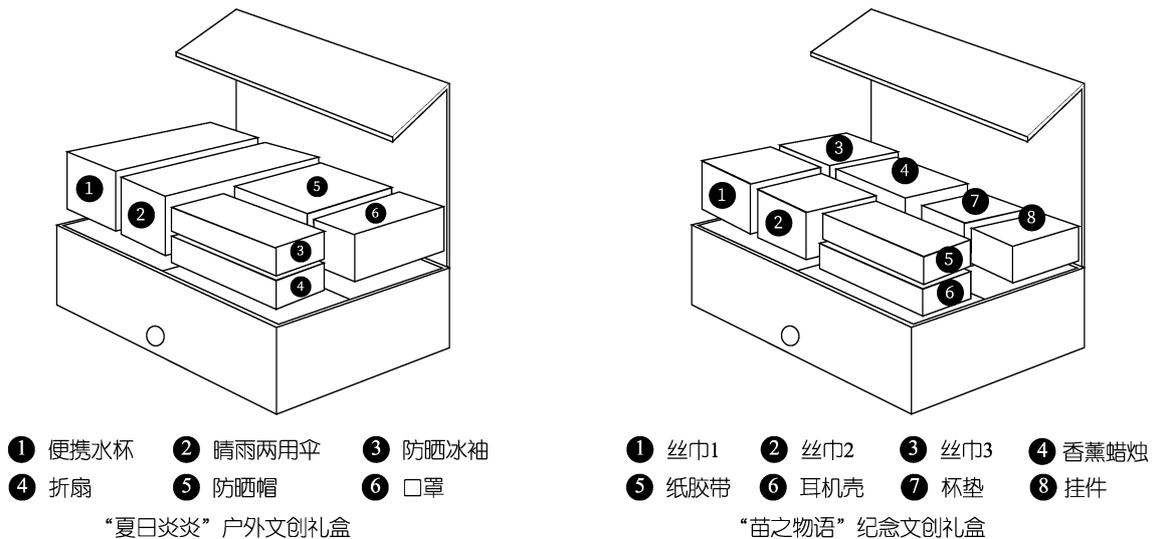


图10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文创礼盒

Fig.10 Qianlongnan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主要是从纪念性和实用性出发,考虑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实用功能主要体现在绣片、服饰或背儿带等物品上,因此选择丝

巾这一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的织物载体,并将经过创新设计后的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样运用到丝巾上。丝巾可系在颈间、缠在手腕、扎于发尾、绑于背包,

并通过多样化的图案与配色来满足消费者的多种搭配需求。基于前文可知，经二方或四方连续创新演化的苗族刺绣纹样为矩形条状，根据此特点，结合纸胶带产品使用，取其连续不断的外形与“福意连绵”的寓意，为消费者打造出沉浸式的纹样体验。这一系列的文创礼盒还包括香熏蜡烛、无线耳机盒、生活挂件、杯垫等，以纪念品的形式进行展示结合。这些体积较小的文创产品不仅便携，而且在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便于消费者购买后长久保留，见图 12。“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在保障功能与审美的基础上，将黔东南苗族刺绣纹样所蕴含的“富贵安康”“驱邪避灾”“子孙繁盛”等意蕴，通过文创产品这一介质进行可视化呈现，实现文化价值与现代产品的衔接，使这些纹样符号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展现出其所蕴含的独特精神内涵，既能够拓宽大众接收的维度，实现对传统民族纹样的感知与理解，又能带给用户丰富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

此外，随着社交媒介的广泛运用，如何利用电子媒介进行设计转化，实现静态视觉符号的生活化，增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是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设计转

化的又一关键所在。近年来，微信红包封面一直受到用户的追捧与喜爱，诸多品牌方也开始运用这种形式进行品牌传播与营销。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也应抓住这一契机，将已有的设计方案与微信红包封面相结合，来增加其曝光度和知名度。此次微信红包封面设计包括：红包封面、聊天气泡和领取页面三部分（如图 13 所示），通过提取和重构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的符号语言，并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来提升受众的新鲜感与舒适度。当用户领取到自己中意的红包封面后，会以向他人展示或发朋友圈的方式实现多方互动，既满足用户的社交需求，也在无形之中实现了对黔东南苗族刺绣文化的交流与宣传。以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为主题的微信红包封面设计使传统图案纹样不再囿于普通媒介载体，改变了人们对民族图案只能依附于布料或物品的传统认知，将其符号语言的传递路径拓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户在使用微信红包时就能够获取一定的情感体验。同时，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视觉符号也借助现代的社交媒介实现了转型，从而丰富了人们的体验形式与情境价值，兼顾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形式美感，凸显出黔东南苗族刺绣的艺术价值与时尚度。



图 11 “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
Fig.11 Summer heat outdo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图 12 “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
Fig.12 Miao Zhi Wu Yu commemorative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图 13 微信红包封面设计
Fig.13 Cover design of WeChat red envelope

4 结语

辫绣图案已成为黔东南苗族刺绣文化的一种图形艺术符号,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诠释与传递着族群历史、造物法则和审美情趣等各种信息,是符号语言的集中展现。本文总结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中的三大符号特征:“以线编辫”的工艺符号、“崇尚自然”的纹饰符号,以及“五彩共施”的色彩符号。在此基础上,运用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理论体系,从语构、语义和语用的层面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地阐述分析,深度挖掘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为辫绣图案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不仅如此,本文进一步提取出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经典符号元素,将其进行抽象变形与解构重组的再设计,最终设计出以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元素为题材的主题文创产品。本文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学研究与设计转化的探讨,旨在用现代设计语义唤醒传统文化蕴藏的内在活力,为实现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交融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 [1] 刘玮, 吴智慧. 黔东南苗族动植物刺绣纹样的设计语义解读[J]. 艺术评论, 2016, 14(11): 157-160.
LIU Wei, WU Zhi-hui. The Desig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Miao Animal and Plant Embroidery Patterns in Qiandongnan[J]. Arts Criticism, 2016, 14(11): 157-160.
- [2] 赵红艳, 叶洪光, 洪钰, 等. 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纹饰特征探析[J]. 纺织科技进展, 2019, 26(7): 43-47.
ZHAO Hong-yan, YE Hong-guang, HONG Yu, et al. Analysis on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in Southeast Guizhou[J]. Progress in Textile Science & Technology, 2019, 26(7): 43-47.
- [3] 黄玉冰. 西江苗族刺绣的技法研究[J]. 丝绸, 2011, 48(2): 43-49.
HUANG Yu-bing, Study on Xijiang Miao Embroidery Techniques[J]. Journal of Silk, 2011, 48(2): 43-49.
- [4] 卢靖. 黔东南苗族刺绣图案数据库构建与设计应用研究[D].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18.
LU Jing. Research on the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Miao Embroidery Pattern in Qiandongnan[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2018.
- [5] 梁鑫鑫. 百鸟朝天之空灵——非遗苗族刺绣百鸟衣研究[J]. 汉字文化, 2019, 31(3): 148-149.
LIANG Xin-xin, The Void of Birds Facing the Sky—A Study on the Embroidery of Hundred Birds' Clothes of Miao Nationality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2019, 31(3): 148-149.
- [6] 刘莹. 黔东南苗族服装龙纹图案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3, 29(12): 26-27.
LIU Ying, A Study on Dragon Pattern of Miao Costume in Southeast Guizhou[J]. Journal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2013, 29(12): 26-27.
- [7] 王强, 李玉波. 图形语境[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WANG Qiang, LI Yu-bo. The Voice of Graphics[M]. Shanghai: Shanghai Shanlian Book Store, 2007.
- [8] 赵燕, 孙宁. 苗族服饰色彩分析——红色的独特作用[J]. 流行色, 2019, 16(4): 45-46.
ZHAO Yan, SUN Ning. Analysis on the Color of Miao Costume—The Unique function of Red[J]. Fashion Color, 2019, 16(4): 45-46.
- [9] 范国祖, 石德富. 黔东南苗族色彩审美与象征探源[J]. 贵州民族研究, 2015, 36(10): 123-126.
FAN Guo-zu, SHI De-fu. Color Aesthetic Preference and Symbolization of the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5, 36(10): 123-126.
- [10] 莫里斯 C. 指号、语言和行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MORRIS C.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11] 张鹏, 林鸿. 产品语义学视角下的中国传统葫芦图案研究[J]. 工业工程设计, 2019, 1(1): 57-64.
ZHANG Peng, LIN Hong. 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Gourd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Semantics[J].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19, 1(1): 57-64.
- [12] 杨昌国. 苗族服饰: 符号与象征[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YANG Chang-Guo. Miao Costume: Signs and Symbols[M].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13] 杨熊炎, 叶德辉. 符号学视域下侗锦文化元素现代转化应用研究[J]. 包装工程, 2022, 43(14): 343-353.
YANG Xiong-yan, YE De-hui.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ong Brocade Cultur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2, 43(14): 343-353.
- [14] 丁伟, 张倩瑜. 基于设计符号学的文创IP设计体系构

- 建与设计实践[J]. 美术大观, 2021, 27(3): 140-142.
DING Wei, ZHANG Qian-yu.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P Design System Based on Design Semiotics[J]. Art Panorama, 2021, 27(3): 140-142.
- [15] 王伟尧, 张毅, 杨丽. 宫廷审美视域下南京云锦的符号学探析与丝巾图案设计[J]. 丝绸, 2021, 58(6): 116-123.
WANG Wei-yao, ZHANG Yi, YANG Li. A Semiotic Analysis and Scarf Pattern Design of Nanjing Broc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yal Aesthetics[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6): 116-123.
- [16] 梁惠娥, 时蕾. 论苗族服饰中龙纹图案染织绣技艺之美[J]. 丝绸, 2011, 48(4): 32-34.
LIANG Hui-e, SHI Lei. Study on the Beauty of Batik, Weaving and Embroidery of Dragon Pattern in the Miao Nationality Costumes[J]. Journal of Silk, 2011, 48(4): 32-34.
- [17] 刘春晓, 单筱秋, 张毅. 丝巾设计中的唐代团窠动物图案创新[J]. 丝绸, 2020, 57(4): 112-118.
LIU Chun-Xiao, SHAN Xiao-qiu, ZHANG Yi. Innovation of Combined Animal Pattern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Silk Scarf Design[J]. Journal of Silk, 2020, 57(4): 112-118.
- [18] 张欣蔚, 王进, 陆国栋, 等. 基于本体和形状文法的图案构形提取与重用[J].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8, 52(3): 461-472.
ZHANG Xin-wei, WANG Jin, LU Guo-dong, et al. Extraction and Reuse of Pattern Configuration Based on Ontology and Shape Grammar[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2018, 52(3): 461-472.
- [19] 齐海涛. 符号学语意下非遗视觉元素创新衍生设计探析[J]. 包装工程, 2020, 41(20): 195-199.
QI Hai-tao. Des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ual Elements Based on Semiotic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0): 195-199.

责任编辑: 蓝英侨

(上接第266页)

- [23] 马丽莎, 茅健, 万子平. 基于灰色模糊层次法的机床设计质量综合评价[J]. 轻工机械, 2018, 36(2): 97-103.
MA Li-sha, MAO Jian, WAN Zi-ping.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Machine Tool Design Quality Based on Grey Fuzzy Hierarchy Method[J].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2018, 36(2): 97-103.
- [24] 李雪瑞, 侯幸刚, 杨梅, 等. 基于多层次灰色综合评价法的工业设计方案优选决策模型及其应用[J]. 图学学报, 2021, 42(4): 670-679.
LI Xue-rui, HOU Xing-gang, YANG Mei, et al.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Industrial Design Scheme Based on Multi-Level Gre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J]. Journal of Graphics, 2021, 42(4): 670-679.
- [25] 刘世豪, 廖宇兰, 王涛, 等. 木薯挖掘铲多目标决策方法及其仿生设计应用[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15, 21(1): 67-75.
LIU Shi-hao, LIAO Yu-lan, WANG Tao, et al. Cassava Digging Shovels' 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Bionic Design[J].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2015, 21(1): 67-75.
- [26] 张琳, 赵静. 产品色彩设计意象评价的数理方法研究[J]. 机械设计, 2014, 31(12): 108-111.
ZHANG Lin, ZHAO Jing. Mathematical Method Study on Image Evaluation of Product Color Design[J]. Journal of Machine Design, 2014, 31(12): 108-111.
- [27] 王可, 陆长德, 乐万德, 等. 基于 Lab 均匀色彩空间的色彩调和系统[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4, 22(6): 695-699.
WANG Ke, LU Chang-de, Yue Wan-de, et al. Color Harmony System Based on Lab Perceptual Uniform Color Space[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2004, 22(6): 695-699.

责任编辑: 陈作